第一章　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

第一节　后金的崛起与建国

一、满族的兴起

满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她最早的先人在先秦时期叫做“肃慎”，世居东北地区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乌苏里江两岸，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袤沃野地区，东邻库页岛等岛屿。在两汉至三国时期，她叫做“挹娄”，两晋南北朝时期改为“勿吉”，隋唐时期又被称为“靺鞨”，到了唐朝晚期以后，又改称为“女真”（辽代时也曾一度叫过“女直”）。

早在传说的舜、禹时代，“肃慎”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并向中原地区进贡过弓矢。西周朝初期，“肃慎”人也曾向武王、成王和康王等进贡过“楛矢”、“石砮”等物。汉、唐以后，他们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切，双方人员往来频繁，进贡贸易几乎代代不绝。大约在北宋末年时，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建立了金国。此后她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大举向南方发展、骚扰，先后灭掉了辽国和北宋政权（并掳掠了北宋徽、钦二帝），占领了中原黄、淮广大地区，不久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来进驻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只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部分返回了东北原居地，其他大部分人都与当地的汉人融合了。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兵南下灭掉了金国。后来元朝政府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立了征东元帅府，管辖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

明朝时，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一带，海西女真大部分居住在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的松花江南岸，野人女真则分布在从精奇里江下游到库页岛的广大的黑龙江流域。明朝政府先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辽东都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其进行行政管辖。

在明朝前期和中期时，明政府曾经开通了通往奴儿干地区的驿路，设置驿站，并多次派人到该地巡视、安抚和训谕女真各部。后来便索性直接任命女真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和百户等职务，通过他们对女真各部民众进行统治。于是女真酋长们常常带着明政府颁发的“印信”和土特产（如人参、貂皮、东珠、松子、木耳、蘑菇、蜂蜜、鳇鱼和马匹等物),定期到北京朝贡，并为明政府守土保疆。他们表现得非常谦恭，可以说是对明政府言听计从，十分温顺、驯服。当时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贸易往来也很频繁，明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了一些“马市”，让女真人用马匹和土特产品从汉人手中换取铁器、耕牛、陶器、粮食、种子、盐、布匹、绸缎、绢帛、棉线以及针、剪等工具和生活必需品。

二、建州女真的变迁、移居以及与明朝的关系

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中，建州女真实力最强，接受汉人的影响最深，社会经济发展得也最快。由于女真三部发展不平衡，各部之间的杀掠、动乱便随之而起。明朝

初年所设的建州卫，本来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交汇处三姓（即今黑龙江省依兰）附近，到明朝中叶，由于野人女真的不断骚扰，建州女真开始往南迁移。在明宣宗(即宣德年间)时，建州卫指挥李满住带领建州女真人，从三姓迁居到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宁安）不久又迁移到婆猪江(即今佟家江)流域 后来又几经迁居，主要在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活动；最后在明英宗(即正统、天顺年间)时，移居到浑河、苏子河上游的一个叫“ 赫图阿拉 ”的地方（今辽宁省新宾满族县境内）定居下来。

明朝政府对女真的统治，主要是采取“ 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 ”的“ 分而治之 ”的政策，常常是打一部，拉一部，在各部之间制造各种矛盾。再加上防、抚、剿三管齐下，使其各部相互牵制，不致统一，所以一直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还对女真各部实行着有效统治。后来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渐强大，便把它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

后金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就出身于建州左卫的一个贵族世家，姓爱新觉罗，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据说，他的始祖布库里雍顺是仙女佛库仑在长白山天池洗浴后，吃了放在她衣物上的灵鹊衔来的(红)果所生。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他的六世祖猛哥铁木耳（亦称孟特穆），却是实实在在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其曾祖父福满（亦称福满柱）和祖父觉昌安(亦称叫场)也都曾做过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其父塔克世(亦称塔失、他失)继任指挥使。努尔哈赤 10 岁时，其生身母亲去世，其父再娶后，他便常常受到继母的虐待，因此与继母关系十分紧张。19 岁时，他与其父分居，只分得了很少的家产，从此开始了独立生活。他经常带着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去抚顺城与汉族商人交易，并曾一度在明将李成梁部下当差。在与汉人

的接触中，他对汉族文化和明朝的内部情况了解得越来越深了。他对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很感兴趣，反复翻阅，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增长了军事才能和作战本领。

明政府为了防范女真向辽河流域（特别是辽西走廊一带）渗透和发展，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开始，修筑了一条长1700余里的“辽东边墙”和不少“寨堡”。与此同时，明统治者，尤其是驻守在辽东的一些边将，也加强了对女真人的搜刮和剥削，从而激起了女真酋长的怨愤和反抗，酋长们纷纷思叛。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明将李成梁率军帮助建州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建州右卫酋长阿台时，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后来明政府虽然任命努尔哈赤袭职为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加龙虎将军衔，并赐给他多封敕书和30匹马，以表歉意，但最终也未能平息努尔哈赤心中的怒火，误杀一事成了他日后反明的口实。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其父留下的13副铠甲起兵，以为父、祖报仇为名，讨伐尼堪外兰，并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一开始，努尔哈赤还不敢与明朝公开对立，表现得很恭顺，照常到北京朝贡，并表示要好好为明廷“看边效力”。这样前后经过20余年的战争，他基本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进行了一些政权建设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立了“八旗制度”。它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进行生产和军事行动时，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名为“牛录”（满语，汉译为“箭”）。其头目为牛录额真（满语，汉译为“主”），即汉译“佐领”。实力壮大后，改为300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共1500人，其头目为甲喇

额真，即汉译“参领”。5 个甲喇为一“固山”（满语，汉译为“旗”），共 7500 人，其头目为固山额真（即旗主），即汉译“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时，只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由于部众增加，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设了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形成了八旗（后来由于大量蒙古人和汉人加入，又按同样的形式设置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总计 24 旗，但仍泛称“八旗”）。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即“共主”），并自统正黄、镶黄两旗；他的子侄分别统帅其他 6 旗，称为“和硕贝勒”或“固山贝勒”。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努尔哈赤还设立了大臣 8 人，断事官 14 人等，处理行政事务，并制定了各种法规、律令。此外，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命额尔德尼、噶盖等人创造了新的女真文字“满文”。

三、后金的建立与对明的战争

努尔哈赤的羽翼日见丰满，势力逐渐增强，已具有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本钱。于是他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停止了向明朝进贡，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式称“汗”（即“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即“兴京”），从此公开与明朝抗衡起来。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太祖天命三年，1618），后金与明朝关系公开决裂。努尔哈赤以“杀父、杀祖”“欺凌实甚”与“支持叶赫”“阻挠、压制女真统一”等“七大恨”告天，誓师进攻明朝，揭开了反明战争的大幕。

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很快便攻下了抚顺城，明朝守将李永芳率众投降。接着后金军又占领了明朝的另一座边城清河。在这种形势下，明政府决定给予还击。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太祖天命四年，1619），明廷以杨镐为主帅，统领四路大军，号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7 万人（实际不足 10 万人），攻打后金。双方在萨尔浒（在今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地区）展开激战，史称“萨尔浒之战”，结果明军大败。接着后金军又连克铁岭、开原诸城。自此双方力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后金军转入攻势，而明军处于只能勉强消极防御的形势之下。

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军乘胜进击，于天启元年（后金太祖天命六年，1621），相继攻下辽阳、沈阳、宽甸、海州等 70 余城，并定都辽阳，后又迁至沈阳（后称盛京）。次年，后金军大举向辽西进军，不久就攻下了广宁（今辽宁北镇）、义州（今辽宁义县）等地。天启二年（后金太祖天命七年，1622），明政府派孙承宗经略辽东，加强防守，着意经营，使局势稍有好转。特别是在孙承宗派袁崇焕镇守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以后，袁着手加固城池，囤积粮草，添置西洋红衣大炮，有力地阻止了后金军的凌厉攻势，并收复了辽西一些失地。后来，孙承宗因受宦官魏忠贤陷害，被革职罢斥。继任辽东经略的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驻地必不可守，便尽撤关外守备。但袁崇焕却抗令不从，执意固守。天启六年（后金太祖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 13 万人，兵临宁远城下。双方经过几天激战，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后金军大败，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重伤，退回沈阳。从此他闷闷不乐，又患了背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去，终年 68 岁。

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被拥戴继位，皇太极时年 34 岁，年号天聪。他又带兵继续攻打锦州、宁远，但还是没有攻下。于是他改变策略，对明朝暂时打出“议和”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革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团结了内部，健全了体制。同时，

他先后征服了朝鲜、蒙古、野人女真和东北其他土著民族，并且招抚了明朝驻守在辽东的将领孔有德、尚可喜和耿仲明等人，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崇祯八年（后金太宗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宣布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次年夏四月，他又宣布改“大金”为“大清”（据说改“金”为“清”含有“阴阳五行说”的意义，一般认为，明朝朱姓为“火”，“火”能克“金”，而“清”旁有“水”，“水”能灭“火”，因此便将“金”改为“清”），接受诸贝勒、贵胄、蒙古王公和明降将的朝贺，从此做上了“皇帝”，改元“崇德”，与明朝崇祯皇帝公开分庭抗礼。从崇祯二年（1629）至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先后 4 次派兵取道蒙古，从京师（今北京）北面的喜峰口、大安口、独石口和墙子路等处突破长城，攻入关内，骚扰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抢掠了大量人口、财物。其中在崇祯二年的进攻中，清军曾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兵驰援，双方在广渠门外展开激战。后来由于皇太极使用“反间计”，崇祯皇帝不辨真假，便以“卖国欺君”“倡为和议”和“谋叛”等罪名，将袁崇焕下狱处死。

皇太极总结了几次攻入内地的经验和后果，觉得还是消灭驻守在辽西走廊和山海关的明朝有生力量最为重要。因此，他从崇祯十三年（后金太宗崇德五年，1640）开始，在辽西义州（今辽宁义县）一带修筑城池，驻军屯田，形成了对锦州、宁远的包围。次年，在松山（今锦州附近）与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的明军展开激战，史称“松山之战”。结果明军大败，洪承畴被俘投降，不久锦州守将祖大寿也率军缴械投降了“大清”。于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的“锦宁防线”彻底破产，防御据点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明朝覆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第二节　清朝的正式建立与清初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清军入关与对农民军的镇压

崇祯十六年（后金太宗崇德八年，1643）秋，皇太极突然去世，有关皇位继承问题，在他的兄弟子侄（主要是豪格、多尔衮、代善和济尔哈朗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彼此相持不下。最后才通过了由多尔衮（努尔哈赤第九子）提出的一个妥协、折衷的方案，即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 6 岁的福临继承皇位，年号顺治，是为清世祖；由其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为辅政王，共同摄理政事，待小皇帝长大成人后再还政于他。其实真正的军国大权，都掌握在多尔衮一人手里。此时的明朝政府，未能利用这个满洲贵族争权夺利的时机，发动反击，收复关外失地。而多尔衮却在掌权后反过手来，向明朝展开了攻击。但他几次攻打战略要地宁远城不下，无法从山海关攻入中原，只好取道蒙古，突破长城关口，对中原进行骚扰。

由于明朝统治者的政治腐败和横征暴敛（为进行针对后金的战争加征“辽饷”“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征“剿饷”），以及多年的天灾等原因，明末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在陕北地区爆发了农民大起义，不久起义便犹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不可阻挡。崇祯十六年（1643）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了西安，控制了全陕。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顺利攻克了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亲率农民军主力经山西太原,北上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直奔北京,形成了对北京的包围之势。后经昌平、居庸关等地，于同年三月十九日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亦称万岁山,即今景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于是统治全国 276 年的明朝宣告灭亡。

以睿亲王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者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时机已到，于是立即大规模地集结军队，重新制定了军事政策,以为明朝复仇和‘吊民伐罪’的名义,打着‘摄政王’和‘奉命大将军”的旗号，率领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以及明朝降臣范文程、洪承畴与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大举南下，浩浩荡荡地向山海关进军。

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看不到形势的严峻,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军纪松弛,领导层中也出现了腐败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统战工作中都有许多失误。例如，他们居然向已经投降的原明朝贵胄、官僚们‘逼饷’(即勒令交出资产、钱财,搞所谓的‘追赃助饷’),引起了原明朝已降的贵胄、官僚们的恐惧和不满，使他们纷纷组织武装自卫，抗拒大顺农民政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吴家原籍江苏高邮,后迁至辽东中后所(在今辽宁省绥中境内)。吴三桂之父吴襄也是一员武将,做过总兵、提督,总管京师兵马。农民军进京后，抄了吴家，囚禁了吴襄，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已经表示降服农民起义军，并接受了李自成 4 万两白银犒饷的吴三桂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倒戈向清统治者请求援兵，发誓要与农民军血战到底；这就是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投降清军后，便亲率 20 万大军（实际

6万），并带着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人，匆匆向山海关奔来。李、吴双方军队在山、海之间的东西罗城与北翼城展开激战。正在酣战之时，阿济格和多铎率领2万余名清军突然杀进阵中助战,使得农民军大败,仓皇西撤。农民军走到永平时,李自成下令杀了吴襄，回到北京。同年六月初三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登基仪式，第二天便离开了京城，向西而去。多尔衮在山海关打败农民军后，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拨给他马步兵1万人，让他充当马前卒追杀农民军，自己则统领八旗劲旅，直驱北京。

六月五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齐化门（即今朝阳门）进入北京，明朝百官出城五里外跪迎；多尔衮在武英殿接受了他们的朝贺。当年九月,顺治帝(福临)与诸皇族及满洲贵族、奴仆、兵丁一起迁居北京，十月一日，福临告祭天地，正式即皇帝位，定都北京。这标志着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正式开始。

清军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就立即命令阿济格、多铎和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农民军。李自成节节败退，衰势已经遏制不住，后来退至陕西西安，并制定了进军甘肃、巩固陕西的战略计划。顺治二年(1645)正月，清军沿着太行山麓攻至陕西边界,双方在潼关展开激战,结果李自成战败,被迫放弃陕西,南下河南、湖北和江西,转战于襄阳、武昌等地,但连连失地。当年五月，李自成等人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下遭遇突发事件，被当地的地主武装杀害。农民军的其余部分，高举抗清旗帜继续战斗，又血战了二十来年。

李自成牺牲后，张献忠在四川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本想弃川赴陕，但受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共同夹击，只好在川北地区迂回作战，最后在四川西充的一次战斗中被清军射死。至

此，大西农民政权也宣告瓦解。大西军余部也参加了抗清斗争。

二、各族（主要是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汉族地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问题。当时，满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汉族落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掌握好局势，巩固政权，对清朝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个难题。为此，以睿亲王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者，采取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施相对减轻人民负担，以及革除明朝的弊政等一系列措施，用来缓解矛盾。但与此同时，他们采取的许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例如颁布剃发、易服令，大肆圈占土地，推行逃人法等，又加深了民族矛盾。特别是剃发令提出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口号，被广大汉族人民视为是奇耻大辱，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尊严。因为蓄发是汉族人民几千年的习惯，并且汉族人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教诲的影响。早在清军入关不久，这一政策就遭到了北方人民的强烈反抗。畿辅（今北京周围地区）、直隶（今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的广大人民群众，曾联合农民起义军余部，共同打击清军和投降清朝的地方官吏。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地区以官文彩为首的嘉祥县满家洞的农民军和以任七、张七及李化鲸为首的曹州（今菏泽）的榆园军。他们攻城略地，斩杀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其他帮凶，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减缓了清军向江南进军的速度，对形成全国第一次抗清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江南地区，人们都聚集在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小朝廷周围，进行抗清活动。但是这个小朝廷内部，拉帮结伙，相互排挤，矛盾重重且腐败透顶，根本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抗清斗争，只有督师扬州的大学士史可法（曾任南京兵部尚书）认真备战，决心与清军大战一场。史可法与以多铎为首的清军激战十余日，最后被俘拒降，壮烈牺牲。清军占领扬州后，为了报复，连续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接着清军渡江，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攻克南京，弘光政权宣告灭亡。此时，清政府又重申“剃发令”，这就更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反抗。江阴人民提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他们在典史阎应元和陈明遇的领导下，与清军坚持斗争了 80 多天，击毙敌军 7.5 万人，后来弹尽粮绝，城池被清军炮火攻破，接着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全城民众几乎尽被屠杀，无一人投降。在江阴人民抗清的同时，嘉定人民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他们在黄淳耀和侯峒曾领导下，先后三次举起抗清大旗，又三次被清军镇压，嘉定城也三易其手，人民遭到三次屠杀，仅第一次就牺牲二万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定三屠”。此外，在苏州、吴江、昆山、松江、嘉兴和湖州等地，人民也进行反剃发的抗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军南进的锋芒，为浙江、福建的明朝残余势力重新组建抗清小朝廷提供了机会。

顺治二年(1645)六月，避难于浙东的鲁王朱以海，在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和举人张煌言的拥戴下，于绍兴建立临时政权，号称“监国”。与此同时，在福建福州又建立了一个以朱聿键为首的唐王政权，建元“隆武”。该政权的支持者主要有明原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泉州总兵官郑芝龙和礼部尚书黄道周等。鲁王、唐王都以抗清、雪耻号召百姓，并开始与李自成的余部联系，主张联合抗敌。他们派何腾蛟等人赴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合称）一带的农民军大营，进行督师，很快在此掀起了抗清新高潮。但是这种大好形势未继续下去，他们在清军的强大攻

势下，被各个击败。后来，唐王政权中的郑芝龙不听其子郑成功劝告，剃发降清，并引清军从仙霞岭进入福建。顺治三年（1646）八月二十四日，福州失守。八月二十七日，唐王朱聿键在长汀被清军杀害，至此，隆武政权宣告灭亡。

顺治三年（1646）十一二月，在广东肇庆建立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的最后一个朱姓政权。隆武政权覆亡后，原明朝在两广的官吏丁魁楚、瞿式耜等人，便拥戴万历皇帝之孙桂王朱由榔为帝，改元“永历”。这个政权虽然兵多将广，地盘也较大，但它一开始内部就矛盾重重，再加上永历帝生性孱弱，胆小怕死，因此不敢正面对敌，经常采取以“走”为上的政策，到处逃亡。它先后在梧州、平乐、桂林、全州和南宁等地落脚，但都没有久留。就在此时，驻守在湖广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在李锦（李自成之侄）和部将郝摇旗等人的带领下，参加了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他们与何腾蛟部合兵，在全州与清军激战，取得了大胜，收复了不少失地。次年，已经投降清朝的原明朝将领李成栋、金声桓、姜瓖在广东、江西和山西分别“反正”，倒向永历政权。再加上郑成功、张名振又活跃于闽、浙等地，使抗清局势日益好转。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对农民军缺乏信任，结果白白葬送了这种大好形势。顺治五、六年间，清军进行全面反攻，又重新夺回了江西、湖广、广东等省，并占领了大半个广西。永历帝逃到了贵州。李锦病逝，他的养子李来亨与郝摇旗率部至川东、鄂西一带山区继续抗击清军。

桂王朱由榔在狼狈逃遁到贵州之际，遇到了大西农民军的余部。这支部队是在张献忠死后，由其部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统领来到云贵地区的。双方经过协商，决定实行联

合，共同抗清。大西军接受永历年号，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便掀起了一个抗清新高潮。顺治九年(1652)八月，李定国率军经靖州、全州、严关等地，攻克了桂林，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杀身亡。李定国乘胜前进，不久就收复了广西全境。接着又进军湖南，很快就打到了衡州（今衡阳），并斩杀了清军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刘文秀部在四川也曾打败过吴三桂，夺回了重庆、叙州，并向成都挺进，赢得了永历政权建立以来抗清的最大胜利，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此时永历政权内部却发生了内讧，特别是隐藏在大西军内的野心家孙可望，时时窥视着永历帝的皇位，总想取而代之。他还嫉妒李定国，认为李是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一心要将其除掉而后快，因此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此时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督办西南战事，洪熟悉南明政权的内部情况，因此清军反扑节节胜利，李定国等人的军队连吃败仗，失去了许多城市。顺治十三年（1656)的春夏之交，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引起了孙可望的极度不满。于是孙在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亲自率领十几万大军，以“清君侧”之名征讨李定国，但他并没有得到部下的支持，战败后投降了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清军分三路向云贵进发,连连得手，于次年正月攻下昆明。永历帝带着家眷逃亡缅甸。李定国则率军退到云南边境孟艮，坚持抗敌。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将永历帝父子从缅甸俘至昆明，于同年四月将他们杀害。李定国也于当年六月病逝。这样，轰轰烈烈的永历政权与大西军联合抗清的斗争就至此结束了。而大顺余部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在川、鄂交界地区组成‘ 夔东十三家 ”,继续坚持抗清斗争，直至康熙三年(1664)九月,才被清军彻底镇压下去。

三、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领导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1624—1662),因隆武帝赐姓“朱”,故俗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石井乡。他生于日本九州岛平户,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一说是平户“翁氏”之女)。郑成功7岁时回国,青少年时期曾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并考中秀才。其父郑芝龙多年从事海商和海上武装走私(即“海盗”)活动,后来归顺了明朝,顺治三年(1646)又投降了清朝。郑成功虽多次苦劝,但其父就是不听,他只好率部在粤闽交界的沿海一带“背父救国”,继续坚持抗清斗争,以泉州、厦门、金门等地为基地,与清军长期对峙。他积极与永历政权联系,奉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等职。顺治九年至顺治十年(1652—1653),郑成功率领10万大军,配合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掀起抗清高潮,曾一度占领了澄海、漳州、漳浦等地,并派水师南下潮州,与李定国部会师,北上长江口的崇明岛。后来,由于清军疯狂反扑,以及海上风浪等原因,只好退兵。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合,率领17万水陆大军北伐,先后占领了崇明、镇江等地,并一度围困南京。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攻占了芜湖,并分兵四出,收复了徽州、太平、池州(今贵池)等30余府州县,给清军以重创。但是,由于郑成功轻敌、自满,犯了战略上的错误,结果被清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好退回厦门;张煌言也逃入山中,后来辗转回到福建。此后,清廷加强了对郑成功的围攻,并颁布“迁海令”,强迫沿海30里之内的居民迁往内陆,“片板不留”,对郑成功实施经济封锁和坚壁清野政策,妄图切断他与广大人民的联系。

因北伐失败和永历政权的覆亡，郑成功处境愈加窘迫。于是他便想收复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以此为抗清基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直到明朝末年才被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占领。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又从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赶走了西班牙人，独占了全台湾，并进行殖民统治，残酷地压迫、剥削当地人民。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留其子郑经镇守金门、厦门等地，自己率领水师 2.5 万人，船舰 900 余艘，从金门的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列岛，从鹿耳门登上台湾岛，并攻占了赤嵌城。接着又围困台湾城达 9 个月之久，终于在康熙元年（1662）十二月十三日接受了荷兰人的降书，彻底收复了被外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了 38 年的祖国宝岛台湾。当年夏天，郑成功病逝，享年 38 岁（周岁，一般说 39 岁），长子郑经嗣位。此后不久，郑氏军事力量全部撤至台湾，金门、厦门遂被清朝占领。郑氏父子苦心经营台湾，建设台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实行屯田政策，寓兵于农。同时注意军队纪律，保护高山族百姓利益，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等，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使台湾的经济、文化有了一定发展，受到了台湾人民的欢迎。

第三节　清朝前期对全国的统治及其政策、措施

一、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与稳定

清军入关后，经过短短的十七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站稳了脚跟。顺治皇帝去世后，其第三子玄烨 8 岁登基，改元“康熙”，即历史上有名的康熙皇帝。

当时康熙皇帝年龄幼小,不能亲政,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共同辅政。四入当中,鳌拜自恃军功最大,又是老臣,因此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渐渐独揽了“辅政”大权,政事、用人皆由己出,根本不把康熙皇帝放在眼里。这是小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帮助下,于康熙八年(1669),设计将鳌拜逮捕拘禁,并清除了他的党羽,夺回了实权。

康熙帝执政初年,天下并不太平,政局也未稳定,因为盘踞南方的汉人军阀割据势力“三藩”(即驻扎在云贵地区的“平西王”吴三桂、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与其子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以及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仍然存在,他们依然是康熙帝的心头之患。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以老病之由上疏请求归返辽东,由其子尚之信袭封留镇。康熙帝此时正想削弱“三藩”势力,于是立刻下令全藩北撤。尚可喜上疏时,吴三桂和耿精忠也虚情假意地提出撤藩,以试探朝廷虚实。没想到康熙帝下令同意全部撤藩,使他们大失所望,于是决意起兵造反。当年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公开叛乱。紧接着耿精忠于次年三月在福建举兵反清。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尚可喜病死,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也起兵反清。

“三藩”叛乱后,康熙帝立即派兵镇压。同时也十分注意分化瓦解他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吴三桂,而对耿、尚则采取宽大政策,进行怀柔、拉拢、分化,宣布只要放下武器,就不予以追究。耿精忠在康熙十五年夏兵败投降。康熙十六年(1677)初,尚之信看到大势已去,也向清朝乞降。于是清军进驻广东。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已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